

中国网络媒介的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ZhongGuo WangLuo MeiJie De
ZhuLiu YiShi XingTai JianShe YanJiu

王爱玲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网络媒介的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王爱玲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王爱玲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01-013786-5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计算机网络-传播媒介-意识形态
-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5055 号

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ZHONGGUO WANGLUO MEIJIE DE ZHULIU YISHI XINGTAI JIANSHE YANJIU

王爱玲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278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3786-5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王爱玲的《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一书即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不仅对于她来讲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对于她所在的学科来说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部专著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改而成,我愿意在她这部专著出版之前说几句话,不仅因为她是她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因为她是人文学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算比较快毕业拿到博士学位的一位年轻教员,还因为她对网络媒介的舆论及意识形态研究一直抱以极高的热情和踏实钻研的态度。

“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这个题目应该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选题,不仅因为这个选题既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和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新闻传播学有着很强的交叉性,这是其一;其二,“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这个题目又有一定的歧义性,其关键词涉及到中国网络媒介、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建设,还潜在地涉及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搞清楚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网络媒介中的表现,还是中国网络媒介有一套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三,主要是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研究。“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或关键词是“言人人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意识形态’毕竟是20世纪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不仅在不同的时代,而且在同一时代不同人那

里,都具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①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这个题目,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流变过程以及“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

意识形态”概念最早于1796年被法国观念学家、经济学家特拉西提出,用以说明观念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全部科学。到了19世纪法国一批被称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因对宗教采取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同时反对拿破仑重建君主专制、坚持自由的信条,因此意识形态被拿破仑赋予了一层特殊含义:意识形态是荒谬的诡辩术、是人们苦思冥想编造出来的理论与幻想。进入19世纪以后,马克思以否定的态度说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为统治阶级辩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这一观点不仅在19世纪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至20世纪仍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具有深远的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谓意识形态,指的是对作为经济基础的反映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即任何一个社会所具有的艺术、宗教、哲学、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和其他社会意识。它是一种为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治合法性和思想合法性辩护的关于自身利益或自身存在价值的观点的合理体系。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只要国家、阶级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消亡,意识形态的终结学说是与国家、阶级的存亡紧密相关的。然而,自从1893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首次提出有关“意识形态的终结”之后,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几乎就没停止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曾较早的涉及这一话题。他主张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从强调“价值理性”到强调“工具理性”的转变,价值理性是对终极价值的态度,而工具理性则是指实现目标的有限手段。这一转变的结果将使人们对绝对目标的狂热信奉走向破灭,从而导致出现意识形态的衰落。继恩格斯、韦伯之后,卡尔·曼海姆在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系统而明确的论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问题。

^① 季广茂:《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对于恩格斯曾设想的在废除了对民众的压抑后,意识形态便会逐渐消亡的论点,曼氏认为,这种变化即使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会发生,如果一个社会能发展到较为优越的工业化结构,从而具有一定的弹性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底层的人们生活的好一点,那么,社会下层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谋求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动便会逐渐消弱,而不管给予下层人们这种权利来充分保障其生活的是较为优越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曼氏的理论模糊了阶级区,对20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阿尔伯特·加缪于1946年最早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他在法国社会党内部争论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理论界中得到了重大的发展,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1954年为阿多诺在法兰克福主编的《社会学》一书中写下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现代社会中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认为,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相互依赖的加深,民族主义正在走向弱化;而自由主义由于不能提供共同体意识也正在走向失败;作为最后一个大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是虚假不实的,也正在走向失败。然而,与众多左翼思想家抱着惋惜之情来谈论意识形态动员功能的日益消失不同,阿隆对这个时代的到来表示了热切的欢迎。他认为,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只能是来自价值理性向功能理性的转移,这或许不无遗憾,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可喜的变化。因为在阿隆看来,“人们拒绝神化一个阶级、一种斗争技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①,并不会妨碍他们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阿隆的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主要反对人们人为的赋予现代意识形态一种神化的性质,将其作为终极价值来追求,并且为了达

^① 冯克利:《阿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读书》1998年版,第150页。

到这一伟大而深远的境界,而不惜采用集权、恐怖和大规模的杀戮。正如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向那些深陷在意识形态泥潭中的人们发出的警告:“政治还没有发现避免暴力的秘诀。但是,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阿隆所指的“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在“后神话时代”无疑是指现代意识形态的终极话语。事实也证明,20世纪种种集体暴行的出现与作为各种历史“正义”的意识形态神话都不无关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阿隆在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提出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在那次大会上,阿隆、波拉尼、克罗斯兰和贝尔等与会者一致主张19世纪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已经被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条件所否定。阿隆也因而成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终结”最早的预言者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丹尼尔·贝尔开始了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而开展写作,并于1960年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在该书中丹尼尔·贝尔侧重从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探讨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他认为,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一个经济仲裁者,出现了国家的角色;家族资本主义瓦解了,资产阶级从统治集团中分离出去;从害怕个人债务的封建社会向推崇享乐的消费社会转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显赫的上层社会集团的形成;职业样式的基本变化,产业工人阶级的萎靡不振,工会的停滞不前,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等。因此,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普遍性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都不适用于美国社会。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也已告结束,“意识形态已经寿终正寝了”。在哲学领域,人们可以追溯到最简单的理性主义的衰落,以及关于人的新斯多葛主义——神学形象的产生。此外,贝尔还指出,整个历史呈现给人们的一个简单事实是: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真理性”,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人们不再相信通过制订“蓝图”和实施“社会工程”就能实现一个社会和谐的乌托邦。自由主义者不再坚信国家不应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保守主义者也不再认为福利国家是“通往奴役的道路”。在今天的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彼此

持尖锐对立的立场和观念,而对于如下政治问题则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也已经走向了终结。1988年贝尔在为纪念阿隆而写的文章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断定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一个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的语汇。罪恶亦复如此”^①。贝尔的这种观点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现实性,意识形态的终结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结束了“冷战和对抗”的时代,而且贝尔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日益趋同的见解里,已蕴涵了“全球化”的观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弗朗西斯·福山和亨廷顿为代表,在西方学术界又出现了一股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潮。1989年夏天,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文章中他提出,随着自由民主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美获得全面的胜利,随着20世纪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成功对抗,作为一种正统的统治体系,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胜利。因此,自由民主有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成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在福山这篇论文发表后不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僵持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状态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暂时胜利而宣告结束。一时之间,“历史的终结?”一文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赞扬与指责并存、称颂与批评之声交织,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反击对手的攻击,福山又发表了“对我的批评的答复”,并且他同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也很快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再也不会有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将能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相媲美,尽管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还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尽管有些国家采取的是神权政治或军事独裁,但是它们迟早都会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人类的历史将最终终结于西方社会已经达到的自由民主。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由此福山得出结论,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自由民主已遍及于全球

^①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9页。

不同的地区和文化,成为人类惟一的政治憧憬对象。后冷战时期,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将仅仅是经济的、技术的、环境的问题,再也没有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生与死的斗争。

作为对福山世界将大同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反驳,亨廷顿先是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之后在此基础上,又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核心主张是,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冷战后的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①“权力正在从长期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②因此,在亨氏看来,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轴将围绕“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而展开,其中既包括非西方国家对所面临的西方挑战的联合对抗,也包括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强权的回应,“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但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最有可能产生冲突。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美国”^③。

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西方社会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一方面是出现在社会主义世界中的各种阴暗事件和现象,如二战期间苏联与纳粹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及开展的肃反运动,党对政治活动的绝对垄断,泛化的意识形态观念,对传媒工具及暴力工具的全面控制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将终结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正如贝尔所说:“50年代是一个政治幻灭的时代……有不少社会学家——

①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②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③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如雷蒙德·阿隆、爱德华·希尔斯、S. M. 李普塞和我自己——开始把 50 年代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借此我们是要说明，激进运动的陈旧政治观念已经失掉了活力，它再也无法在知识分子中唤起忠诚或热情了”。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实际上就代表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一个时代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于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根本看法，尤其是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表现出来的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几乎出于本能的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贝尔认为，纳粹的死亡集中营，表现出了一种超乎人类文明想象的暴力与野蛮，而苏联的集中营和大清洗使所有的乌托邦景象都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贝尔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悲观主义、罪恶、悲剧和绝望中找到了智慧的一代人。”他由此产生了对暴力、集权和政治运动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他继阿隆之后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内部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趋同论”的社会历史背景。从 30 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相继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放弃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开始由国家出面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调节和计划的政策，国家的经济职能大大强化，并形成了福利主义的政策。而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不满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相继开始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引进市场的一些机制。在阿隆看来，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特点都是由生产结构、增长和发展目标、技术和组织要求来表现的，因此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趋同是可能的。所以，随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相似点必然越来越多，最终将趋同作为一种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新制度”。作为一种理论现象，“趋同论”可以说是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反映。而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和改革除了在理论层面上促使了趋同论的产生外，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则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阶级矛盾的减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

然而，20 世纪 50 年代流行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思潮，并不意味着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消解了一切矛盾，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或其它形式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就连“意识形态的终结者”贝尔也

不得不说：“我应当指出，有关‘意识形态’的分析并未假定一切社会矛盾均已结束，知识界因而可以摈弃对新思想的追求了。”^①实际上，在50年代的这场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讨论中，意识形态的“终结”主要是指与斯大林模式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这一点可以从贝尔的著作中得到确证：“50年代是政治幻灭的时代，当时正值知识分子同斯大林主义的最后决裂，他们对苏联自称是社会主义的进步信仰也经历了破灭”^②。客观公正地讲，以贝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得出这一结论是片面的、错误的。尽管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有不少错误，但我们也不能无视其带领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何况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过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主要是各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操作和不全面理解而导致的，并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科学所蕴涵的深厚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及对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巨大的、积极的指导作用。

同时，考虑到当时的“冷战”背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共高潮，我们不能不说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这股意识形态终结思潮是为冷战服务的。尽管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已日益显露，尽管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者们一再强调他们对苏联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惧和不满，但正如俄国学者科洛米采夫指出的：“只有政治上缺乏素养的和天真幼稚的人才会看不出‘极权主义’一词与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联系。西方实在想不出比‘极权主义’一词更好的用来对付苏联的‘心理战’工具了”^③。所以西方社会这场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讨论，是为西方国家的冷战和反共政策提供的理论层面的支持和论证。而“趋同论”的实质则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实施“和平演变”的另一理论工具。李普塞特在总结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时说，他们“在讨论意识形态‘终结’或‘衰落’时……从来没有说过一统制政治概念体系的

①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②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③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页。

终结、乌托邦思想的终结、阶级冲突的终结,以及它们与不同阶级或其他政治利益集团之代表所拥护的政治立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终结。相反,我们当时指的是这样一种判断:一统制革命信条与工人阶级反体制斗争运动的狂热感情联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运动反对者与反革命信条的联系——正在衰落。”^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无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如何辩解,其反马克思的用意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20世纪50年代西方理论界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思潮从根本性质上讲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它淡化了阶级区别,模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企图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和反共政策服务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福山和亨廷顿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思潮出现在了世界的舞台。这次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它出现在全球化的时代,所以不仅继续关注社会制度、阶级对立、所有制等传统的问题,而且更多的关注非西方文明、民族主义及性别等问题对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的挑战。这一特点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强大正日益冲击着西方的自由主义世界。以至于象亨廷顿这样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不过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而当代的文化冲突则具有更为不可调和的性质。而福山一再强调的民主与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及其普世的价值观,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这一时期以福山、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表现出了显著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意识形态终结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而高声欢呼;另一方面面对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他们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衰落又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和担心。

福山和亨廷顿实际上都看到了西方文化因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正逐步走向衰落的趋势,所不同的是,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的胜利是“为了掩盖,

^①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页。

首先是对自己掩盖这一事实:即这种胜利从来没有这样病入膏肓、这样摇摇欲坠、这样危机四伏过,甚至在某些方面它已大难临头,而在总体上已经灭亡。它的灭亡不仅是因为马克思的幽灵在今天依然存在,而且是因为实际上它本身就已经灭亡了,通过掩盖所有这些失败、所有这些威胁,人们试图掩盖我们所说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潜在能力——力量和现实性。”^①亨廷顿强调的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左右世界政治的主要冲突。实际上是一方面看到了西方文化中心地位的衰落,一方面又想极力维护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的一种无奈的表现。^②

以上我们简要梳理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产生及其本质,王爱玲在写博士论文时面临的问题就是有些人鼓吹的“网络意识形态终结论”,面对这股思潮,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网络意识形态,我们是承认“网络意识形态终结论”呢?还是进一步厘清“网络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本质,建构好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

20 世纪后半叶,科学技术革命给人类馈赠的最大礼物就是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之上的网络媒介。互联网和网络媒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而且还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大众传播的方式——传媒信息的生产/传输、构建、接受/占用。“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当代理论家未能充分考虑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发展,以及它在现代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媒介的作用”^③。面对这种批评,王爱玲不仅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而且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什么是主流意识形态?她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一社会中占据指导地位或具有统治作用的思想学说,它构成了国家的‘信仰体系’,并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具有终极意

① 德里达:《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8 页。

② 参见洪晓楠等:《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4—323 页。

③ [英]约翰·B.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铨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 页。

义上的力量。”这里所谓的网络媒介,主要是指“将互联网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输平台,作为人类传播过程中运载和传递讯息的物体来分析,和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相比,网络媒介因其依托的技术形式不同,决定了其所承载的信息传输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网络媒介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因此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变化”。在书中,她在论述网络媒介给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着重就执政党意识形态在网络媒介冲击、挑战下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危机(信仰危机和功能性危机)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措施等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和探讨。

从总体上来说,本书是对中国网络媒介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可贵的探索,作者对许多理论问题不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且提出了许多可操作性的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路径——如提出从有效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自身吸引力、提高网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增强主流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把握技术和政策监管的适度有效性等方面切实提高网络媒介中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及价值认同力,这些路径是否有效,我们期待着实践的检验。写到这里,我觉得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作为一篇序言,我必须就此打住。是为序。

洪晓楠

2014年端午节于大连大华锦绣华城博雅园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分析	21
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本质特征分析	22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论	22
二、列宁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发展	25
三、西方理论谱系中的意识形态论	27
四、意识形态本质探析	32
第二节 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论	34
一、“媒介即意识形态”论	35
二、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论	36
三、媒介拟像的意识形态论	39
第三节 大众媒介意识形态的实现方式	40
一、媒介自身权力的显现	41
二、受众的被动跟进	43
三、传播过程的可控性	45
第二章 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解构与重构分析	48
第一节 网络媒介的技术发展及理念嬗变	48
一、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发展	49
二、网络媒介的技术发展原理及其嬗变过程	51

第二节 技术内嵌的网络媒介意识形态解构功能	57
一、自由乌托邦和技术“不可控”	58
二、虚拟技术平权与“直接民主”幻象	59
三、个体价值回归对传统媒介权力的解构	60
第三节 权力渗透的网络媒介意识形态重构功能	63
一、技术的可控性本质	64
二、自由与无序的对立	66
三、平等的反面	67
第四节 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分析	70
一、网络媒介意识形态的虚拟遮蔽性	70
二、网络媒介意识形态的复杂多元化	71
三、网络媒介意识形态的多渠道渗透性	72
四、网络媒介意识形态的交互回应性	73
五、网络媒介意识形态的对抗不安全性	74
第三章 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分析	76
第一节 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式分析	77
一、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价值分析	77
二、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式分析	81
第二节 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特质分析	86
一、“脱域机制”与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彰显	86
二、“倒U模型”与“网络群体意见”的挟持	87
三、信息“协同过滤”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多样性	89
第三节 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	90
一、本质的内在统一性	91
二、表现方式的差异性	92
三、发展中存在的对立性	94
第四章 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现状分析	98
第一节 确立了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内容	100

一、坚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网络媒介的指导地位	101
二、丰富了中国网络媒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内容	104
第二节 创建了更多的网络媒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平台	108
一、形成了多层次对外网络传播格局	108
二、组建了多梯度国内主流新闻网站	114
三、开通了各级政府门户网站	118
四、创建了各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121
第三节 建立了多层次自媒体话语平台	122
一、政府博客、微博客的创建	123
二、新闻博客、微博客的创建	125
三、思政博客、微博客的出现并发展	129
第四节 构建了多维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体制	130
一、立法监管	131
二、技术监管	135
三、制度监管	141
四、行业自律	145
第五章 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分析	150
第一节 网络技术和信息霸权威胁中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150
一、互联网核心技术和标准霸权	151
二、全球互联网监管上的霸权色彩	154
三、西方的强势网络信息话语权	159
第二节 中国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多样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163
一、中国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多样性	164
二、意识形态多样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挑战	169
三、中国网络媒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滞后性	171
第三节 网络媒介对权威的解构与对主流的策反	175
一、“网络问责”对官方的监督和抵抗	176
二、网络话语反讽对官方话语的解构	179